

2004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

博士生分论坛论文集

2004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博士生分论坛筹备组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2004.11.10

G64-53
17

目 录

高等教育理论与人才培养

知识社会转型中的知识与大学	刘志文	1
对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哲学的反思.....	张正锋	7
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农村人口转移.....	王向红 别敦荣	12
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两个体系的解读.....	邹晓平	24
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嬗变.....	缪榕楠	31
高等教育独立性的评价标准及其意义.....	洪 芳	37
个性教育的属性探析	付八军	42
论大学生的审美个性及其培养——康德美学思想的启示.....	常君睿	47
论大学生的批判精神	何雪莲	55
论服务学习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启示.....	刘长海	61
影响个人高等教育选择的因素分类与变迁研究.....	王远伟	68
高校课程评价新视角——运用学生学习日志对一门课程进行评估.....	梁燕玲	76
关于研究型大学本科培养模式的探讨——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为个案研究.....	李 莹	81

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

中国研究型大学异地办学的定位与模式.....	邢志杰	96
从学术到市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的价值取向.....	林 莉	103
高校学术评价标准与管理文化反思 ——质疑 CSSCI 与现行科研人事考核机制的结合.....	陈兴德	110
建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影响因素.....	李文兵	119
论高校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互动发展关系.....	朱永新 杨树兵	125
生态自组织原理与地方高校适应性生存.....	倪胜利	132
合并高校：学科建设之策略	伍运文	137



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

确定成本约束下学费、财政经费的市场化互补模型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 ——向成本补偿本义的回归	卢晓东	143
---	-----	-----



G64-53
17

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	李锋亮	157
重构政府公共权力：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治理取向.....	龙献忠	167
论中央政府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财政责任.....	李碧虹	173
试论我国地方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限——一种基于有限政府论的视角.....	胡炳仙	179
从统治到治理：走向现代大学制度之路.....	何勇平	184
新公共管理与高校教师聘任制.....	朱新卓	189
大学章程法律性质探析.....	米俊魁	200
我国大学校长的法律地位：内涵、影响因素及其实现.....	李庆豪	205
高校教育纠纷性质探析——兼论高校教育纠纷解决对策.....	范履冰 阮李全	213
论高校营销管理.....	李铁林	221
晚清官立高等学校的教育经费问题.....	崔恒秀	225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政策——一种新公共管理视野的分析.....	包海芹	230
以发展学科理论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	茶世俊	239
政策制定过程研究——以 863 计划为例.....	金红梅	246
二元经济结构与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制定.....	刘丽芳	253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苗素莲	257

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

美国大学评议会制度研究——以斯坦福大学为例.....	郭 卉	261
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解析.....	朱晓刚	268
英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文化解读.....	黄启兵	274
美国、中国高校三对基本办学关系之比较研究.....	魏 饴	279
人才强国与中外教师教育改革.....	杨 曦	286

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

教育学学派：中国教育研究的优化模型.....	黄 维	292
开放的研究领域——后现代视阈中的高等教育学科发展.....	梁燕玲	299
从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看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	殷小平	308

知识社会转型中的知识与大学

刘志文^①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分析了知识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的作用和大学所承担的使命。作者认为, 知识是知识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 具体体现为知识价值推动经济转型、知识权力推动政治转型、知识消费推动文化转型。大学是知识社会转型中的主导力量, 大学承担着培养和塑造知识人、创新和传播知识、培育和整合新文化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知识社会; 知识; 大学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我们的时代正经历着一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它正在实际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改造着我们的生活, 并以生活本身的那种切近性和紧迫性向我们展示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我们正在进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知识社会。在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中, 知识作为“一种基本资源”, 将成为“社会的中心, 以及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基础”^[1], 大学作为知识的研究和传播机构, 也将成为知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机构”。知识社会的转型不是哪个人的愿望, 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 我们必须对知识在知识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以及大学在知识社会转型中承担的使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从而使知识和大学的“中心作用”得到真正的发挥。

一、知识: 知识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力

1、知识价值推动经济转型

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型, 首先表现为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知识价值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知识成为推动和牵引经济发展的先导力量和决定性因素。工业经济是资本密集加劳动密集型经济, 生产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等有形的物质资源基础之上的, 知识的经济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据统计,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之前, 在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中, 资金的投入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所起的作用占到70%的比例, 而科技进步因素所占的比例还很低。但到20世纪90年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中, 科技知识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80%, 与世纪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知识已经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经济的最基本资源和最核心的要素。知识成为生产力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知识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扩张, 使知识的占有和配置, 知识的传播、生产、分配和消费成为经济的基本活动方式。正是这种经济活动方式构成了新型的知识经济形态。知识在经济中核心地位的确立, 不仅改

^①作者简介: 刘志文(1972-), 男, 江西余干人,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师, 厦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研究生, 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变了经济的性质和生产要素的结构，而且使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产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经济是知识资源型经济，谁拥有最丰富的知识资源，谁将获得最多的财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8 年初的一份统计，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专利发明来自美国企业。在知识经济最具代表性的领域，如信息技术领域，美国专利占 67.4%；生物技术领域占 57.1%；药品发明占 59.8%。知识资源优势使美国经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知识经济的增长方式与工业经济不同，商品的应用价值和生产成本不再是决定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新技术、新设计、品牌、文化时尚等形成的知识价值成为决定商品价格的主导因素，个性化、知识化的产品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知识经济的发展使知识产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产业这类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据 OECD 的统计，欧美发达国家已达 70% 左右。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的知识含量也因为科学技术的快速渗透得到不断提高。由此可见，知识价值的彰显是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2、知识权力推动政治转型

知识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知识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获得中心地位，而且在政治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影响生产关系的重要力量。知识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权力基础。建立在知识权力基础上的阶级基础、权力结构、决策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工业社会，作为生产手段的土地、工具、设备、技术由于“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而与劳动者分离，资本家成为生产手段的拥有者，而工人成为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资本和财富成为权力的基础，资本家由此在政治上占据统治地位。在知识经济和知识产业中，则开始出现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一体化倾向。在知识社会，作为生产手段的设计工具、计算机和小型实验设施越来越多地为个人所拥有，拥有相应技术和知识的劳动者成为“知识价值”的创造者，“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感觉成了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并且这些手段与劳动力本身已经不可分割地一体化了”^[3]。知识成为权力的基础，使知识阶层崛起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丹尼尔·贝尔认为，知识社会阶层的轴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知识阶层，将取代企业家、商人和工业经理人员成为社会的核心阶层，获得统治地位^[4]。知识权力在推动政治决策方式的转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知识社会，国家和政府的重要决策越来越多地通过大学等智力机构来调节，专家、顾问和专业人员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力量。在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政治首脑经常选择在大学发表它的政治见解，格林斯潘对美国财经政策的影响，厉以宁、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等等都是知识权力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体现。知识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政治原则发生转变。工业经济模式建立在利润原则之上，保障经济利益是政治的首要原则。在知识社会，人们非物质性的需求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教育、健康、环境、文化娱乐，这些需要往往会与追求个人利益、追求经济利益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公共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

3、知识消费推动文化转型

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化是指人类文明成果中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

无形的、深层的、稳定的东西，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文化转型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是人们的主流生活方式，理性和物质财富成为人们主要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拥有并消费大量物质财富的人受到他人的尊敬和羡慕，例如拥有大型的高级轿车，宽敞的高级住宅等等。增加物质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文化精神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一种超越理性主义、超越物质主义，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知识消费、崇尚个性、追求精神满足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正在形成。堺屋太一认为在知识社会，强调“知识价值”，注重“知识消费”的审美观和伦理观念会成为主流的文化精神。“物质意义上的进步无论是从其社会影响来看，还是从增大人们的满足感来看，其效果是递减的”。人们感到“物资已经足够多了，更要紧的是心灵的充实”，“生活的质的提高比量的增加更重要”^[5]。物质消费以大量的物质资源的消耗为前提，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会因为消耗而减少，会因为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物质资源的消费和消耗导致物质资源的需求增加，迫使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进行物质生产，缺少时间进行健康、学习、休闲和社会文化活动。说到底，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知识消费则不同，知识消费以知识的共享和传播为基础，知识资源不但不会因知识消费而减少，反而会因知识的共享和传播而得到增加，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知识社会，人们将不追求对资源、能源和农产品的更大消费，而是追求对时间与知识的大量消费，人们将认为“知识消费得越多越体面”。

二、大学：知识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

1、大学培养和塑造知识人

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的基本职能，这一点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没有什么疑义。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答案就没有那么简单，有的人说应该培养通才、有的人说应该培养专才、有的人说应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答案，难得有一致的结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但关乎大学的职能定位，更关乎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乎大学应该具备的理念和精神。笔者认为，大学培养的人才，其内涵既有变的因素也有不变的因素。变的因素指大学培养的人才，其内涵要求应该随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变的因素指大学应该始终反映时代精神，应该培养社会精英，培养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可以由高等教育发展史得到证明。中世纪大学倡导博雅教育、自由教育，以“自由人”为培养目标，而“自由人”是由地主、贵族、宗教人士等有闲阶级组成的社会精英，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对个性完善的追求、对人性的追求，反映了当时农业经济社会的时代精神。19世纪的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经济、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和技术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科学家、工程师和各类型的专家逐渐成为社会的精英，“专业人员”成为大学的主要培养目标，大学倡导和崇尚科学教育、专业教育，同样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在知识社会转型和发展时期，大学应该成为知识社会培养社会精英的主导力量，培养和塑造代表着知识社会时代精神的“知识人”。

知识社会是知识不断地变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的时代”，对人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这种全新的要求就是“知识人”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人”就是适应知识社会发展

要求的人。具体而言，知识社会对人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四个“知识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6]。学会认知，即不仅要学习经过分类整理的系统化知识，更要掌握认识的手段，学会理解知识；在学习专业化知识同时不排斥普通文化知识的学习；学会认知还包括唤起对知识的好奇心，激发批判精神，培养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学会做事，即要学会运用、实践所学知识，以便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知识社会的工作效率取决于知识应用的效果以及将知识进步转化为技术和产品革新的能力。因此，学会做事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简单地理解为培养某人去从事某一特定的具体工作，学习应有相应的发展变化。学会共同生活，要求人们懂得人类的多样性，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发现他人，以便与他人一道参加人的所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进行合作。学会生存，要求人们在不断变革的时代，正确地理解周围世界，并成为有责任感和公正的参与者，从而保证人人享有他们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尽可能牢牢掌握自己命运而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大学应该将“知识人”的内涵转化为具体的教育理念，体现在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实际行动之中，以与培养“知识人”的使命相适应。

2、大学创新和传播知识

教学与科研是大学的两项基本的职能活动，教学与科研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和创新知识，毫无疑问，大学是创新和传播知识的社会机构。然而，我们通常把教学（人才培养）和科研作为大学的基本职能，而不是把创新和传播知识作为大学的基本职能。究其原因是工业社会中知识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知识在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得到确立。工业社会追求劳动生产率，其核心指标是单位时间内产品数量的提高。知识只是用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手段，追求的是固化的、技能性、工具性的知识。与此不同，知识社会追求知识生产率，其核心指标是知识的创新与技术发明，创造性的“构想”及技术更新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劳动生产率已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一来，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有其学科优势、人才优势、信息优势、学术环境优势。事实证明，许多新学科、新的理论产生于大学，大学是新知识新理论的土壤和温床。过去的20年，在全世界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中，有近70%是由大学取得的。知识社会不仅要求大学成为知识创新的中心，还要求大学成为孵化知识产业的基地，带动一批、辐射一批高科技产业、高文化产业。目前，世界各地许多高科技产业园区都是以著名大学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并呈现出勃勃生机，如美国硅谷高科技工业区、日本的筑波科学城、英国的剑桥工业城以及我国的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等，都是将大学的知识创新职能与产业紧密结合的成功案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学科研体制在知识创新方面存在的缺陷。比如，大学科研偏重学科知识、基础理论知识的研究与创新，不注重跨学科知识的研究与创新，不注重知识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应用；在运行机制上有浓厚的计划色彩，缺乏市场机制。因此，大学要发挥知识创新和传播的主导作用，需要对大学的科研和教学职能进行扩展和机制创新，使其符合知识社会对知识创新和传播的新要求。在知识创新方面，应该打破学科体制的主导地位，建立学科科研、跨学科科研、区域科研、产业科研并行的体制；在科研运行机制上要强化与企业、产业、社会力量的结合，形成知识创新的市场机制，加速将知识转化为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提高知识的经济价值。在知识传播方面，大学除了教学这一基本方式之外，还应该主动建立新的知识传

播渠道和方式,充分发挥大学的“知识库”和“人才库”优势,利用大学的杂志发行、图书出版、专业团体、学术团体进行知识传播,服务社会。

3、大学培育和整合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是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最根本的、最终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发展了,文化价值观念或迟或早地都要相应地发生变革^[1]。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社会的形成,要求培育和整合新型的文化价值观念。大学的基本活动表现为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新。大学的这种基本功能决定了大学是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的主导力量。一方面大学通过文化的传播作用,扩大新文化的影响,引导其上升到主导文化地位。同时,大学也通过文化创造功能不断地充实新文化的内涵,扩大其文化影响力;另一方面,大学又通过有选择地传承原有的文化,使原有文化中的精神成为新文化的基础,将新文化建立在原有文化的基上。最终达到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的目的。同时,大学教育活动培养了大批新文化的代言人,他们成为传播新文化、发展新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甚至是决定性力量。大学在培育和整合新型文化中的作用,可以在中外文化发展史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得到证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化价值观首先在大学中得到倡导和发展,大学教育的目标不再是为了灵魂的得救,不再以培养教士与神职人员为主,而是培养具有完善个性、追求尘世幸福的未来社会的统治者和精英人物。大学培养了大批人文主义者,后来都成为文艺复兴的旗手。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首先在大学中得到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在北京大学策动,并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展开,波及全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了中国文化的新时代。

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肯定地说哪一种文化价值观将会在知识社会成为主导的文化精神。但我们可以从一些新生的文化价值观的发展中看到知识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发展方向。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新生的文化价值观。后现代主义文化代表的思想核心是“否定”或“超越”理性主义,他们宣扬差异、解构、多元性和多样性,强调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和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建。他们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社会生产不再是工业社会中以人同机器、技术环境发生关系的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信息的竞争、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科学技术和知识在整个社会中享有特权地位。“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异的界线模糊化,因果性和规律性为偶然性和机遇性所取代,休闲和消费优先于生产,娱乐和游戏取代规则化和组织化的活动,生产形式日益多元化”^[2]。为了实现培育和整合新文化的使命,大学应该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推动代表知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力量的发展;促进新旧文化的整合,为知识社会的文化转型服务。

参考文献:

-
- ^[1] [加]尼科·斯特尔.殷晓蓉译.知识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8.
- ^[2] 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J].教育研究.1999,(6).
- ^[3] [日]堺屋太一著.黄晓勇等译.知识价值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7.51.

-
- ^[4]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7.380.
- ^[5] [日]堺屋太一著.黄晓勇等译.知识价值革命[M].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1987.109.
-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75.
- ^[7] 张应强.文化转型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J].南京化工大学学报.1999,(1).
- ^[8] 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6.

Knowledge and University in the transition of knowledge society

LIU Zhi-we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and the mission of university in the transition of knowledge societ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at knowledge is the inherent motive force in the transition of knowledge society. In this course, knowledge value promotes economic transition, knowledge power promotes politics transition, and knowledge consumption promotes culture transition. University is the leading strength in the transition of knowledge society, which burden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that training and molding knowledge people, innovating and conveying knowledge, as well as fostering and combining new culture.

Key Words: knowledge society; knowledge; university

对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哲学的反思

张正锋^①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 南京 210097)

摘要: 基于科技理性之上的两种哲学在今天看来已经把高等教育引向了歧途, 忽视了教育本质所在。在反思这两种哲学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本体论的哲学作为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为今天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引导。

关键词: 高等教育; 合法性; 反思; 本体论

自从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 大学的发展已经有接近一千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 大学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 以至于已不能简单地用“大学”这一词来概括了, 我们只能用“高等教育”、“中学后教育”等词语来称呼。它在社会中也承担了越来越重要和越来越广泛的职能, 这也成为高等教育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美国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所著的《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认为, “在 20 世纪, 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 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 一种哲学是以认识论为基础, 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 这为世人所认同。但是, 如果说他概括了在科技理性社会中高等教育得以存在的两种哲学, 那么随着世人, 尤其是西方的一批哲学家对近代科技理性的反思, 使我们也不得不对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反思。通过对高等教育现实的考查和反思, 我们发现现行的高等教育哲学的确也存在着问题。

一 对认识论哲学的反思

在布鲁贝克认为, 强调认识论的人, 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哲学中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这得到一批教育学者和哲学家的赞同, 例如, 在维布伦(1918)看来, “探讨深奥的实际知识是学术事业不证自明的目的, 与它可能对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毫不相关。”^[2] 随着科学技术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凯旋, 人们“对知识的探究不仅是闲逸的好奇了, 只有越来越精确的知识验证才能使人们得到满足”。于是, 在高等教育中, 科学研究越来越占据于各种活动的中心, 人们在评判一个大学时, 主要是看他拥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多少。科学理性已经完全占据了大学, 大学也不过是科学理性的附属物, 大学已经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大学的一切工作都得围绕着科学进行组织, 而不是像最初那样围绕教育教学进行。科学研究成为了统治一切的上帝。

我们一般认为, 科学研究在大学的的确立是通过德国著名的教育家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之后完成

^① 作者简介: 张正锋(1977—), 男, 山东泰安人, 陕西师范大学教科院教师,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博士生, 从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研究。

的。当时，洪堡是站在新人文主义等思想上来确定新大学的主旨和方向的。他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主要职能的做法，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没有科学研究，就无法发展科学，也不能培养出真正的科学人才。大学教学必须与科研结合起来，只有教师在创造性的活动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称得上大学教学或大学学习。^[3]并提出了“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他虽然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大学职能，但主要还是把“由科学而达至修养”作为大学的目的，即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所谓“修养”。^[4]大学培养的是有修养的人，只不过要通过科学研究这条途径来实现。

但是由于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在诸多领域的胜利，实证研究成为一切研究的范式，科学理性已经成为整个学术界的统治者。大学也难逃这样的命运，科学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了大学主要任务。当被史家称为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的约翰·霍布金斯在1876年建立的时候，调查研究已是每一个教授的职责，他是同伴和学生的指导者及鼓励者。从他的招生人数来看，霍布金斯大学始终将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上。^[5]在其刺激下，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这类老文理学院，开始转变成成为真正的大学，即把大学的中心放在了科学教育上。其实是把科学研究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在这个过程中，本科生教育相应的被忽视了。以至于上个世纪中叶之后，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提出了要加强本科生教育的主张。1973年，哈佛率先提出要明确文理学院的教育目标。经过数年的酝酿、讨论和修改，由亨利·罗素夫斯基完成了《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关于共同基础课的报告》，以加强本科生的教育。

我们从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的发展可以看出，科学正是凭借着它在学术领域的胜利，把大学的一切工作从以前注重培养学生的“修养”逐渐地转向了仅仅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甚至有些教授则完全把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教育”职责，大学把自己首先是教育机构的本原使命给丢掉了。造成了培养出来的学生仅仅是知道所谓的“科学”，而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来，向何处去，成为精神分裂的人。人的意义已经被科学抽空了，仅仅剩下一个具有物理属性的空壳。已经失去了对生活意义的思考，不能像海德格儿所说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大学已经失去了其本质意义上的东西——教育。它仅仅像赫钦斯所描述的那样，现代大学是“由中心供暖系统维系在一起的一系列独立的学院和系。”^[6]学生进入大学是被训练成科学奴隶，教师也成为科学的奴仆。“人还剩下什么？一个带着科学王冠的消费者。”^[7]教师已经失去了对学生的教育意义，只有所谓科学的训练，仅仅是面对冰冷的数据，已经失去了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和交流，缺乏一种对人的关怀和体察。教育成为了“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而不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互动”^[8]，大学已经失去了其教育意义。

二 对政治论的反思

在布鲁贝克看来，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过去根据经验就可以解决的政府、企业、农业、劳动、原料、国际关系、教育、卫生等问题，现在则需要极深奥的知识才能解决。而获得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的最好场所是高等教

育学府。^[9]并且他认为，对高等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用不着大惊小怪，所有伟大的教育哲学家都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看待，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等都是如此。

确定大学起源的确切日期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最初大学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10]但史家一致认为，意大利的萨莱诺和博洛尼亚大学是欧洲最早的大学，他们都以专业教育为主。大学在经过一段保守的发展阶段之后，技术教育进入大学。在德国建立了工业大学，独立于研究纯科学的古老大学；法国建立了大学技术学院；英国建立了城市学院。而美国则通过林肯时期的《莫里尔法案》和布什提出的《科学：无边的疆界》的报告把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发挥到了极至，以实用主义改造大学，提出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的要求。杰出的英国教育家和评论家埃里克·阿什比曾说过：“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拆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时，他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大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历史已说明这是一次正确的改革，其他国家现在已经开始纷纷效仿这种美国模式。”^[11]康乃尔大学的首任校长怀特特别强调美国的大学必须适应美国的人民，适应美国的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该校在筹办之初就声明“我们将创办一所这样的学校，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获得任何学科的教育”^[12]从此，美国“大学的校园开始成为美国最繁忙的交通路口之一——成为来自全国几乎每个州、每个角落的农场主、商人、政治家和学生的聚汇点。”^[13]

二战之后，大学发展了与企业合作的多种形式，形成了以斯坦福和南加州高校为中心的“硅谷”及以环128号公路的哈佛、麻省理工为中心的“高科技工业园”。在参与各种服务中，教授的生活变成了“在事务性活动中不择手段地进行竞争的历程，制定合同和计划，指导小组和助手活动，指挥一群技术人员，外出旅行，参加各种政府委员会的讨论，为使整个令人激动的事业不致垮台，还必须干其他使人分心的工作。”^[14]教授的教学工作量以及与学生接触的时间已被削减。“教授们更经常地休假或临时地离开学校；有些教授从来就没有在学校正常地工作过。”^[15]由于与公司的合作，使“大学校园内充斥着大量本可由咨询公司去完成的研究项目；而被招入大学的学生却得不到一套知识体系完善的课程教育。”^[16]大学被克拉克·克尔戏称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

大学教育日益沦为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手段和工具。如此以来，“教育对于人类文化来说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就因此被遮破和消解掉了。”^[17]高等教育仅仅把人“看做是一种‘工具’，通过教育的‘加工’而赋有一定的功能，这些功能在人作为大工业生产的‘工具’（劳动力）时发挥了出来，这仅仅把人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物质存在’或‘实体’。”^[18]“他只要具备完成经济生活中某一特定部门里的某项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以及人所称誉的工作态度就足够了。”^[19]所以，尼采便将由理性科学控制的大学斥之为把人变成机器的场所。在高等教育已经失去自我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希望它能给个体提供指导和说明意义呢？

政治论统治下的高等教育，更确切地说是在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统治下的高等教育，已经仅仅是训练而已，它完全抛弃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本质意义。“今天的大学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大学，它的兴趣不在于培养真正的智者，所有的高等学校今天存在的意义究其实质就是培养专业傻瓜”。^[20]

三 构建本体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本体论（或实体论）（尽管有学者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学问，汉译为“存在论”似乎较妥，但我们还是取习惯上的意义）Ontology 历史上起源于形而上学哲学分支，主要研究客观世界的本质。按照本体论的观点，我们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应该首先体现其本质规定的东西——教育，即“成人”。所以构建一种本体论的哲学，以使高等教育走出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或找回所失去的本质意义。

高等教育在科技理性的强烈影响下的两种哲学的支配下，失去了自己，造成了对自己本质职能的遗忘和抛弃。它仅仅从外界来寻求自己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忽视了从自身来寻求自己得以存在的“阿基米德支点”。高等教育在不断的寻求外界支持的过程中，不断的改变自己以适应社会科技发展对自己提出的要求甚至有些是“无理要求”。只注重那些只解决“是”的问题的学问，虽然能够有效地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满足人们在物质财富上的贪婪欲望，满足人们在肉体生存层面上争强斗胜的竞争野心，但它却永远不可能解决人生的目的性问题，无法回答生存的意义问题。^[21]这样它就失去了对人的关照，失去了教育的意义。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沦为了手段和工具。由此决定了人必然陷入片面化和从属化的生存情境之中。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指出：“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22]

一些国外哲学家认为，大学教育的主要使命在于促使大学生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大学生精神的发展。“教育非它，乃是心灵的转向”（柏拉图）；“教育意味着一场极其深刻的精神变革”（伽达默尔）；“教育不断地将新一代带进完整的精神结构，使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之中生活、工作、交往”（雅斯贝尔斯）。^[23]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在他的《完人教育论》中也呼吁：“我只想将出发点归于人。回到人！回到人！只进行人的教育，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回到人，进行人的教育，便会有真正的教育。”

^[24]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有研究者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是教育的出发点。在人、教育、社会三者关系中，人处于最基本的地位，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且人也是教育与社会发生联系的中介。因此，教育理应以人为出发点。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应当把人作为社会的主体来培养；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教育的最高目的^[25]。在教育领域中引发的这种对“人”的呼唤^[26]，成为教育本体论的焦点。而且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不少教育思想家一再地呼吁大学教育要回归到人的教育，要用人类积累起来的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成果灌注于人的心灵，以培植人的德性。”^[27]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培养“和谐的人”、“完善的人”已成为教育家的共识。^[28]所以，高等教育应该依此来建立自己存在的另一种新的合法性哲学——本体论哲学，即成人。

当 1852 年红衣大主教纽曼在都柏林大学进行演讲时说，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非增扩知识为目的。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和科学的殿堂。”“这就是大学的实质所在。”^[29]

现在再来重温这段话，它带给我们别样的意义，大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的确失去了它最根本的东西。现在我们明白了，大学之所以拥有学生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科研院所、职业培训机构或科技咨询公司，它的一切工作必须以培养人为中心，失去了这点它就不能称为大学。这是我们提出本体论哲学的依据，也是我们今天反思所获得的最大的收获！

参考文献：

- [1][2][9] 约翰·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1, 14, 14, 15.
- [3][5] 贺国庆. 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47, 145.
- [4][12] 陈学飞. 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59, 45.
- [6][13][14][15] 克拉克·克尔. 大学的功用[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13, 34, 28, 45.
- [7] 罗伯特·赫钦斯. 美国高等教育[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59, 15.
- [8]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北京：三联书店，1991. 2-4.
- [10] 博伊德·金合. 西方教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126.
- [11][16] 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3, 77.
- [17][21] 何中华. 现代语境中的大学精神及其悖论[J]. 文史哲，2002, (1).
- [18] 金生铉. 理解与教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116.
- [19] 约翰·怀特. 再论教育目的[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72.
- [20] 何塞·卢岑贝格. 自然不可改良[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5.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2.
- [23] 叶文梓. 论教学过程中“大学生的理解”——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诠释[J]. 江苏高教，1999, (2)
- [24] 小原中芳. 完人教育论[A]. 教育学文集. 教育目的[C].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317.
- [25] 扈中平. 人是教育的出发点[J]. 教育研究，1989, (8).
- [26] 蒋仲仁. 研究“人”[J]. 教育研究，1989, (3).
- [27] 张应强. 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4.
- [28] 谷建春. 教育主体论刍议[J]. 求索，2001, (3).
- [29] 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

论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农村人口转移

王向红* 别敦荣**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摘要: 我国农村人口转移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的战略之一。然而,农村人口素质低是制约着转移的“瓶颈”。因此,加快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促进农村人口转移的治本之策。高等教育要充分发挥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必须通过高等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调整、优化学科结构;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等举措来完善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农村人口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超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不能忽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离政策,且城镇化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于1990年末就达到了1.5亿,每年还新增600万农村劳动力。^[1]又加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城市中劳动力过剩问题也日趋严重。我国农村人口转移这种明显的后发性和累积性,导致解决的难度很大,形势很严峻。因此,促进我国农村人口转移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战略之一。本文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视角来探索我国农村人口转移。

一、 我国农村人口转移基本模式与制约因素

农村人口转移主要涉及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转移和往哪里转移。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转移主要以两种基本模式进行。

第一种模式是“异地转移”。这种模式以“刘易斯(A. Lewis)、费—拉尼斯(G. Ranis-Fei)的人口转移模式”^[2]为理论基础,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来解决农村人口转移问题。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前就开始的规模高达数千万人的“民工潮”无序地流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的现象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

然而,数量巨大的民工潮不仅给城市的交通运输、生活秩序带来了压力,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大量农民因不能解决就业问题往往无“工”而返。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以外,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村转移人口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据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1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

*王向红(1975-),湖南娄底人,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别敦荣(1963-),湖北洪湖人,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院校发展与规划、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1] 周济. 发挥职业教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重要作用[J]. 求是, 2004, (11).

[2] 这种模式是一种二元经济模型,以充分就业的假定为前提,通过发展城市工业及其他产业吸收农村人口,从而解决人口转移问题和发展问题。

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转移总量的 23.5%,初中文化程度的为 62.9%,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为 10.2%,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为 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为 12.7%。^[3]

这些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的转移人员已成为我国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主要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要求较低的建筑和餐饮服务等行业中,很难开拓新的层次较高的就业空间,且获得的报酬较低。又加之,在城市中需要较高的生活成本,他们往往在城市务工几年后,带着一点积蓄又返回农村。照此现状,大量农村人口将无法从根本意义上实现转移。然而,一般而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不仅能提高他们自身的生存、发展能力以及生活水平,而且能促进城市繁荣和社会发展。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女往往成为城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同时也成为城市人口中具有高强竞争力的优势人群的事实更进一步说明,接受高等教育是农村人口实现真正转移的基础。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近年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如深圳、上海,为了控制进城人口和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对素质较低的农村人口进城做了一定的限制,而对高素质人员的需求相应增加。

第二种模式是“就地或就近转移”。这种模式以“托达罗(M. Todaro)的人口转移模式”^[4]为理论基础,它纠正了“异地转移”只注重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农村人口的盲目流动不仅加剧城市已有的失业现象,而且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目前,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通过建设小城镇,就近或就地转移农村人口已经开始在我国显示出极其广阔的前景。这种人口转移模式注重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重视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城乡发展失衡,从而在更积极的意义上实现农村人口转移。

近年来,这种农村人口转移模式发展很快。随着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1978年至2002年,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7.92%提高到39.1%,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5]根据测算,到2010年,我国将有1.06亿农村人口转移为城镇人口,到2050年时,将达到5.51亿,届时,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6]更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广东首次提出了城镇化水平的发展目标和本省农村人口转移的目标,按“五普”统计口径,2010年全省城镇化水平达65%左右,其中珠江三角洲城镇群达80%左右。到2010年,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生活就业约830万人。^[7]

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就地或就近转移”模式不仅仅是城镇数量增加和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简单过程,而是重大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不仅仅是表面上把农村户口转变成城镇户口,而是农村劳动力完成了从效率低的农业产业(比较原始的耕作)到效率高的农业产业或非农产业的转移。这很类似于刘易斯、费—拉尼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中所认为的,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到非

^[3] 教育部人文社套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课题组.推进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3,(5).

^[4] 这种模式与“刘易斯(A. Lewis)、费—拉尼斯(G. Ranis-Fei)的人口转移模式”截然不同,它建立在失业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本身就是发展的目标,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解决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是发展农村和农业自身,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最终使二元性消失。

^[5] http://www.chinapop.gov.cn/rkxx/zxbd/t20040524_13159.htm

^[6] http://www.chinapop.gov.cn/rkxx/zxbd/t20040326_11685.htm

^[7] 广东:全省830万农村人口转到城镇 http://www.chinapop.gov.cn/rkxx/gdkx/t20040525_13172.htm

农业部门时，这些剩余劳动力也就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换。

从目前来看，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的发展，拓展就业空间才是加快农村人口转移的根本。例如，小城镇应当积极发展地方特色的产业和产品，重点发展与大城市工业协作配套的产业、与农业产业化协调发展的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是城市、农村持续发展的根本，只有产业发展了，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农村人口真正意义上的转移。

无论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是小城镇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都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显然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文化素质不高是我国农村人口的基本特点。以 1998 年度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状况的统计结果为例，农村人口的素质可见一斑。

农村劳动力文化状况^[8]

指标	1990	1997	1998
文盲半文盲人数	20.73	10.10	9.56
小学程度	38.86	35.12	34.49
初中程度	32.84	44.30	44.99
高中程度	6.96	8.91	9.15
中专程度	0.51	1.24	1.46
大专以上	0.10	0.33	0.37

根据对农村人口转移的两种基本模式的分析可知，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低是制约转移数量、转移层次的重要因素。农村人口素质与人口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农村人口受教育的层次越高，其转移速度越快、就业层次越高。

二、加快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促进农村人口转移

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为推进农村人口转移，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随着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化，仅仅掌握初等和中等教育水平的文化知识已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无论是“异地转移”还是“就地或就近转移”，都必须以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与培训为基础。因此，加快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促进农村人口转移的治本之策。

（一）高等教育大众化有利于减少低龄新增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口转移的压力

由于农村土地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农村人口基数又很大，农村人员（例如，农村中学毕业生）如果没有继续升学的机会，很大一部分就会加入到需要转移的人口大军中去，从而增加农村人

^[8] 资料来源：1999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转引自王德海.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及战略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 2001, (9).